

他从长衫先生改当打铁工人

播火 1920：李中是谁？

本报记者吴霞

上海老渔阳里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曾居住于此。在这栋石库门建筑的一楼，挂着块黑板，人们至今还能看到上面写着“访客交谈限15分钟”，因为来访客人太多，陈独秀应接不暇。但有个人却是例外，陈独秀对他非但没有时间限制，还邀请他同住一个屋檐下。之后，陈独秀建议他改名，甚至派他去当打铁工人，在工人中“播火”。

他叫李中，和毛泽东、蔡和森等是湘江之畔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挚友。在陈独秀的建议下，李中从知识分子改行当工人，并成为了中共历史上早期工人党员……6月3日，聚焦早期工人党员李中的纪录片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实人文频道首播，不到30分钟的影像揭示黄浦江畔这段波澜壮阔的“播火”历程。

改名“李中”：胸怀全局，胸怀中国

1920年，“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大本营——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就需要向工人阶级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谁合适呢？陈独秀想到了李中。

陈独秀认为：“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发动和依靠他们，我们得设法在那里做做试验。”陈独秀的建议，让李中想到了有“中国第一厂”之称的江南造船所。1920年6月，李中进入了江南造船所。陈独秀建议将他原名的李声澹，改成“李中”。“陈独秀为什么要叫他改名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要他把这个名字改成李中，这个‘中’代表‘中国’，要他胸怀全局，胸怀中国，为中国革命事业进行奋斗。”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徐国梁说。

脱下长衫，换上工服，青年工人李中走进了黄浦江畔的江南造船所，成为一名打铁工人。一边在车间打铁，一边积极联络广大工人，传播先进思想。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李中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早期组织当中第一个以工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他不是一般的工人，他是从知识分子转化为工人的，所以他对中国工人阶级的观察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发表“宣言”：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

1920年9月26日，李中以“上海海军造船



大图：摄制组赴湖南省档案馆寻找李中档案（图片来源：纪录片出品方）。 小图：李中像

所工人李中”署名，在《劳动界》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他旗帜鲜明地喊道：“将来的社会，要使它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它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它变个工人的世界。”这个宣言犹如闪电划破上海滩十里洋场，被称为“工人阶级觉醒先声”。

1920年10月3日，李中和陈文煊等人在渔阳里6号外国语社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到会的有上海造船厂、电灯厂、厚生纱厂、东洋纱厂、恒生纱厂等工人代表80人。李中为临时主席，在会上作报告。

李中介绍了上海机器工会的宗旨：“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启汉、王平、吴溶沧6人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会议，并成为机器工会的“名誉会员”。

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也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作为书记部的重要成员，李中等26人联名发出宣言，豪迈宣告：“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之后，在上海、在香港、在武汉，在广东、在湖南、在河北，在安源煤矿、在京汉铁路、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星火燎原，势不可挡。

主创团队：为什么选李中？

纪录片《播火 1920》由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出品。全片28分钟，容量不大，困难不小。之前没有人做过类似题材，没有参照，创作起来异常艰辛。但主创团队认为，挖掘记录身边的红色财富义不容辞。

位于长沙的湖南省档案馆藏有70万卷的档案材料，在珍本库房，摄制组找到了李中和毛泽东的学籍档案。“我们在这一本1917年的同学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信息：毛泽东，字润之，25岁，籍贯湘潭。当时，他在第八班就读。同时，我们可以在第七班的同学录中看到：李声澹，字印霞，21岁，来自湘乡（今双峰县）。《播火 1920》总导演、撰稿刘丽婷说。

片名从《播火地》到《播火者》再到《传递火把的人》，最后定名《播火 1920》，出品人鱼洁说：“我们想聚焦1920年这个承上启下的年份，这一年里，一个叫李中的人，做了些什么，这一年，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又发生了什么。”

历史的河流势不可挡，滚滚向前。播火1920，这星星之火引导中国革命进程，影响中国的现代和未来。

位于上海市九江路111号的大陆银行旧址，悬挂着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的“优秀历史建筑”铭牌，经常有文史爱好者来此参观。20世纪30年代，这座银行大厦内曾设立一家私人诊所，诊所合伙人之一就是马海德医生。

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1910年生于美国，祖籍黎巴嫩。1933年，马海德在欧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到上海考察东方热带病。当他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命运随之改变。

1934年秋，马海德有幸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鼓励下，马海德参加了外国进步人士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内有知名人士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大陆银行大厦内的诊所，一度成为学习联络点之一，宋庆龄还曾将此地安排给中共地下党组织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

1936年，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的马海德参与撰写并公开发表《上海铤而走险的工人卫生研究》。同一年，他从上海出发到西安，最终抵达陕北，同行的另一人就是后来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在陕北，马海德背着医疗卫生包救死扶伤，此外还作为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负责向宋庆龄提供当地医疗物资的需求报告，并参与物资接收和分配工作。

1937年，马海德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年，他将自己的名字乔治·海德姆改为中文名“马海德”。他生前曾回忆在陕北的经历，认为自己正是在那里“从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变为一名为了解放战争而奋斗的战士”。

自此，马海德始终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脚步。新中国成立后，马海

数风流人物

“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块书页状的石碑上，有这样一行文字。

说过这句话的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个长着外国面孔的中国人。

1915年4月，爱泼斯坦生于华沙一个犹太家庭。两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居住在哈尔滨，后在天津定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爱泼斯坦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战地记者生涯。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香港——在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前线，他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始终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

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参加了记者团前往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写的20余篇通讯在《纽约时报》发表，并收入《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该书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被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延安，他积极主动帮助那里的中国同行们。新华社的第一条英文电讯，就是经他改写后播发的。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邀请，爱泼斯坦回到中国，参加新中国对外宣传杂志《中国建设》（后更名为《今日中国》）的创办工作。

马海德：此生无憾为中华



马海德像 新华社发

德加入中国国籍，1950年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投身于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和建设。

马海德致力于全国范围内的性病和麻风病防治和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

他将消灭麻风病定为奋斗目标。得知中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不少人患有麻风病时，他长途跋涉到山寨、草原宣传防治知识，治愈数以万计患者。在普查疾病时，他让身边的医务人员从他的手臂上先抽血，消除群众的疑虑。

在国际交往中，马海德从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出发，生动介绍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在《中国建设》杂志英文版上，马海德撰写《美国出生，中国成长》《在中国的新生活，重访美国》等文章，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

1988年10月，他在北京去世。这年5月，他还在家中召开研究麻风病防治工作的会议，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会议。

他曾这样感慨自己的一生：“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我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事，死也无憾了。”

马海德被授予“最美奋斗者”“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等荣誉称号，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近年来，在马海德开启革命生涯的上海，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参观展览等缅怀这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记者许晓青）新华社上海6月2日电

爱泼斯坦：洋面孔 中国心



爱泼斯坦像 新华社发

爱泼斯坦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他共事几十年的《今日中国》杂志社原第一副总编辑张晋曾这样总结说，爱泼斯坦为中国对外宣传所作的贡献远不止改好一篇文章或者办好一本刊物，而是从战略和战术层面为新中国外事事业建言献策。

“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置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爱泼斯坦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病逝。妻子黄沈碧至今仍保存着爱泼斯坦当年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和入党申请书。泛黄的纸页上，一个个英文单词背后，是一颗火热的中国心。

“他一心向着中国，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名誉。”黄沈碧说，爱泼斯坦一辈子写的就是中国，他似乎就是为中国而生的，对中国爱得深沉、爱得清澈，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中国人一般从爱国主义走向国际主义，而我则是从国际主义走向爱国主义。”爱泼斯坦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自己的一生。（记者潘洁）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大别山：一门五忠烈，红色家风励后人

红色家风故事

新华社郑州6月1日电（记者牛少杰）在大别山，河南境内最高峰金刚山，流传着一段悲壮的革命故事：一名红军女游击队员为掩护战友，痛失出生仅6天的女儿。

这名女游击队员就是曾祥有的奶奶张敏。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离开后，鄂豫皖苏区几乎全部丢失。部分红军战士、伤员、妇孺等陆续转入大别山腹地金刚山，后组编为赫赫有名的“金刚山妇女排”，依托沟壑顽强斗争，张敏就是其中的一员。

1936年冬，金刚山下起了大雪，敌人又趁机搜山“围剿”，而5天前张敏刚生下一个女儿，母女俩和战友藏身在金刚山的一个山洞里。由于经常缺粮断炊、营养不良，导致张敏身体较差、缺少奶水，孩子常常饿得哇哇直哭。

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只要孩子一声啼哭，就会暴露战友的藏身之处。张敏无暇多想，一把

将空瘪的乳头塞进孩子嘴里，将她紧紧抱在胸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短短的十几分钟，却像几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敌人走远了，战友安全了，张敏却发现怀里的女儿早已没了呼吸。

“多少年后，奶奶讲起这段往事，眼里还是噙着泪花。”曾祥有说，爷爷曾少甫是便衣队长，两天后下山筹粮归来，才得知女儿夭折，“他只是坐在地上叹了口气，转身便去安慰奶奶。因为他们都明白，要革命就会有牺牲。”

曾祥有介绍，1929年起，曾少甫全家8口人陆续投身革命队伍，共有5位亲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他的爷爷曾耀先曾担任赤卫队司务长，后被捕牺牲，时年56岁；太奶奶曾曹氏当过赤卫队员，被捕牺牲时57岁；二爷曾庆山是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的一名连长，1932年牺牲于商潢战役，时年24岁；四爷曾庆平1930年被民团杀害，时年16岁。那个出生仅6天的“姑姑”，还没来得及取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这样，先辈们以自己的壮烈牺牲，让大别山

红旗不倒。为了让后代铭记革命家史，曾祥有根据爷爷曾少甫的回忆，把先辈们的事迹详细记录下来。在先辈英勇事迹的影响下，曾祥有很早就萌生出参军的想法。

1975年，曾祥有入伍。临走前，曾少甫把曾祥有叫到跟前嘱咐，到了部队要严守纪律，争取早日入党。带着爷爷的嘱托，曾祥有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服役4年，他3次受到部队嘉奖，在入伍期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家探亲时，我把党费证拿给爷爷看。”曾祥有回忆，爷爷非常高兴，摩挲着证件反复念叨，“这才是我所希望的，要为党、为国家多作贡献！”

先辈们光荣的奋斗史，激励着一代代曾家后人参军报国。除了曾祥有，曾祥有的大哥曾祥启、弟弟曾祥海也先后入伍，3个姐妹也都嫁给了军人。让曾祥有感到自豪的是，子侄一代也有5个当兵的，而且大多都是党员。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但保家卫国是永恒的主题，我们从先辈手里接过的红色信仰，必将一代代传递下去。”曾祥有说。

创新曲线后半程，中国制造如何高质量发展？

最近，“反向输出”这个概念反复被提起。它集中发生在近五、六年的制造业领域，高铁、地铁、无人机、5G通信等技术均迎来创新曲线的后半程，开始从中国反哺世界。

最近的一次“反向输出”发生在汽车制造领域，新能源汽车赛道，广汽埃安实现了整车技术与产品的反向输出，成为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又一样本。

“反向输出”，成为创新拐点

“反向输出”，指的就是中国技术向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输出，其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多年的技术输入带来了深厚的积累；其次是巨大市场与人才优势带来的大国红利；最后，是来自“逆全球化”的外部刺激。

要理解“反向输出”，不妨观察一下正在弯道超车的中国汽车制造业。

中国汽车行业弯道超车的时代机遇

2015年，汽车行业从业者发现，“市场换技术”的传

统合资模式，并不能让中国汽车工业真正强大。而中国汽车行业想要弯道超车，只能把握住“新能源汽车”这一时代机遇。

还好，在多年的发展中，中国汽车制造业已经逐渐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整车控制器和电机控制器，并迎来了电池管理技术的喷涌。

其次，发展新能源汽车已被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国家有关部门都会出台新的政策，为新能源汽车行业保驾护航。

最后，随着一些新消费理念的显现，比如不迷信外国品牌，愿意尝试更环保也更科技的新产品。

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大量的造车企业涌入这个市场。这其中有人主张自持品牌、掌控软件系统，强调“轻资产”，不做整车的“造车新势力”，也有生产与技术并重，更加脚踏实地，也更加举重若轻的传统车企，比如广汽埃安。

越过“创新拐点”，可以赢得什么？

广汽，可算是中国最传统的车企之一，多年的发展

过程中，广汽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合资合作，也注重自主创新。

2009年，国家首次提出实施新能源汽车战略时，广汽就开始谋划自己的“新能源汽车硅谷”——一个工业4.0版本的数字化自主决策的工厂。

正是依托成熟的体系和创新的意识，广汽埃安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等方面都给出了优秀的答卷，这一进程最显著的结果就是，广汽基于第二代GEP纯电专属平台开发的iA5轿车，反哺给了丰田，实现了整车技术的“反向输出”，创造了历史。

实现整车技术的反向输出后，广汽埃安进入上升的快车道。尤其是在2020年11月，广汽埃安正式品牌独立运营之后，据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透露，埃安品牌聚焦在电动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后续将会投入以1000亿元为单位的产业链整合投资，实现“持续深化可持续能源生态的利用，同时构建未来智能出行生态”。

一个国家的汽车工业水平，往往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整体工业水平。所以，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的意义不止于行业。

一方面，它能以完善产业链的形式推动中国整体工业水平的进步。另一方面，它也昭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要向价值链中高端转移；要争取技术的突破，实现“反向输出”。



广汽埃安实现了中国车企率先向合资公司输出整车技术和产品